

# 民主論壇

第一卷 第四期

這一週

編輯室

和平的展望

公誠

論工資政策

馬序

人類學在邊政

應用

馬長壽

生活叢談之一

鄒文海

我對於中國民主的看法

呂克雄

與蔡尚思先生論「國情」

傅瑞華

• 逢星期六出版 • 售一千五百元 •

# 這一週

## 大學風潮

### 接近尾聲

全國大學學生所發動如火如茶之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現已由緊張而入於鬆弛。北平學聯，決議停止「六二」團體遊行，惟在校內舉行紀念儀式。上海學聯因勢力營救被捕學生，亦議決停止「六二」遊行。其他各埠，在軍警嚴密戒備下，均能平安渡過。六月二日以前，數大學曾受軍警包圍，並搜捕學生多人。武漢大學發生搶殺學生慘劇，其他學校，亦有兇毆事件。此類事件，使教授憤慨，使學生不安，以至宣言罷教者亦有數起。現各地負責當局，表示不至再有搜捕情事，並保證被捕者之安全，一般情緒，較為平靜，如再能溫和勸導，學潮或可告一結束。而正本清源之方，仍在政府猛加反省，改變政治作風，一掃敷衍苟且積習，努力復興建設，使青年之苦悶，得以解除，而後淳良學風，庶可有望。

## 參政會與和平運動

大家對於和平的要求，日益見其熱烈。參政會中，對此項主張，曾於提案二十多起。而開會討論的時候，也是唇槍舌劍，興奮異常。有人主張對中共下討伐令，而認為和平即是幫助中共講話。但和平提案終於在參政會結束前一致通過了。辦法三項：（一）請政府

再度申明繼續貫徹「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問題」之方針；（二）請中共迅派代表來京與政府雙方無條件恢復和談，本「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之原則，積極研討迅速實行；（三）本大會閉幕後，由本會主席團及駐會委員會本此次大會決議之精神，於最短期間促成和平之實現。大公報社評認為「這三項決議雖極簡略，但參政員諸君確是代表了民意，向政府與中共雙方提出了最誠懇而迫切的呼籲。」我們認為此項呼籲能否架起政府與中共之橋樑，尚待詳細方案之草擬。

## 經濟動態

參政會對於經濟和財政也提出了幾個提案。主要的一個，江庸等主張：「迅速向美磋商借款，安定經濟展開建設，惟款項絕不能移作他用。」這個提案不失為補救以往經濟上失策的善良方法。外債不妨舉行，但用途應該有個限定。假使借款真能用於建設，對一般的國民生活計才能有所幫助。何基鴻氏提出的修正案，「借款用途，應由民意機關監督使用」，更為扼要。但這不能祇是一句空話，參政會應妥密設計監督的辦法才是。

參政會通過其他提案甚多，關於國防者主張「倡導精兵主義，提高國軍素質」關於外交者主張「迅速接收旅大，交涉還我港澳。」又通過改善公教人員待遇，嚴

禁非法逮捕人民及保護新聞記者安全等提案。在各方緊張與暴戾的空氣中，很可以點綴一些祥和的氣象，但切實的效力，並不是幾個提案可以奏其功的。

### 一、日本

## 遠東近况

日本由民主，社民，國民協同三黨所組成之新內閣於六月一日正式成立。片山（社民）出任首相。政府政團在衆議院中佔三〇五席，吉田所領導之反對黨（自由黨）則佔一二九席。但在參議院中，政府僅佔二五〇席中之八十九席。片山曾由外務省事前發表聲明，新內閣對共產主義擬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六月二日廣播中亦稱：對共產黨已絕緣。

日本近成立青年行動團，參加者多係過來的軍人，實為一新的恐怖組織。該項團體最近活動對象，為以暴力挾制工會，以增加勞資糾紛。將來演變，可能形成一種新的法西斯組織。

在日本的各種動向中，證明其並不因戰敗而放棄野心。日本希望與美國共同託管琉球羣島，在千島羣島及庫頁島附近取得捕魚權，並在台灣取得特別移民權。前首相吉田茂曾對麥克阿瑟元帥提出對於和約之希望，此項文件，強調日本對其週圍島嶼法理上之地位，並指出因此項島嶼之喪失所予日本之嚴重打擊。現內閣則藉防共之姿態，謀實現吉田茂所提出之種種希望。

### 二、印度

英政府提出之對印方案，包括下列重要各點：一、孟加拉與旁遮普兩省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以前，實行回

教徒與印度教徒分治。二、現有中央政府代以兩個分離的內閣。三、選出新制憲議會，草擬回教分治國之憲法，現有議會將草擬印度教徒之憲法。四、西北邊省之命運由公民投票表決之。五、在英軍退出印度前，印度將由兩個自治領組成之，可以自由退出不列顛聯邦，另由各藩邦組成第三自治領，可以保持獨立，加入印度教徒分治國或回教分治國。六、信德省立法會議將召開特別會議，以決分治問題。七、如旁遮普省決定分治，西北各隣近省份之選民，將舉行複決，以決定是否與旁遮普省採取相同措置。八、英屬俾路支之處理辦法，將於日後宣布。九、如孟加拉實行分治後，回族佔多數之阿薩密省可舉行複決。十、如印度決定分治，巴基斯坦之代表將另行組織制憲議會，制定其憲法。其制憲代表將由新選舉中選出。十一、印度藩邦之地位，並不因此新方案有所變改，即英國在各該地區中，仍具有「最高之權力」，直至英國全部撤退時為止，此後如分治計畫實現，各藩邦可參加印回任何一方，或自行獨立。

該項計劃，印度領袖均願接受。尼赫魯稱：「我相信目前的決議是對的。我們所要的統一不是出於強迫，而是由人民自由團結。這種方法也許能使印度更強大，更安全。」辛格說：「我無寧叫這個計劃是解決方案，它不能討好任何人，但是它有的價值，讓我們接受了。」真納則說將以英國的方案交給回聯作最後的決定。

# 和平的展望

公 誠

從客觀的環境說，內戰不能再打，而且亦無法再打下去了。對外的抗戰，人民都是咬緊了牙關支持的。友邦人士，凡於抗戰時期到過中國者，莫不對中國人的忍耐力表示十分驚訝。到處是貧窮，到處是饑荒，到處是疾病，到處是破壞。然而，中國人不但沉默地忍受着一切厄運，並且還勇敢地以消瘦弱之軀與敵人死拚。這一幅圖畫，想到了就要令人下淚，凡是這一切，固然證明我中華民族愛國情緒之熱烈，犧牲精神之崇高。而同時亦證明我們的一切，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們想想兩年以前淪陷區域以及大後方的情形，就不知有多少瘦如骷髏的人影浮動於我們的眼前。好了，抗戰結束了，而自家人却又要因爭統治權而火拚起來，當然所有的中國人都不肯贊同的。請問人民還有什麼財力來維持兩方面前線的消耗？還有什麼人力來補充兩方面前線的軍隊？我們還是到處饑荒，到處饑荒，到處疾病，到處破壞，而這種種情形的延長要損傷國家的元氣，這種種情形的加重，會斬斷國家的命根！

最近立法院提出和平的方案，參政院提出和平的方案，以至學生為反對內戰而罷課遊行，這都是當然要有的事情。人民在日漸接近死亡的時候，一定要發出呼援的哀鳴，誰能說這是不合理的？在中共區域，大多數人沒有發出這樣偉大的運動，這祇指出中共之更為專制，更為武斷，中共甚至沒有允許人民在臨死之前作最後的掙扎。我們要求政府允許我們傾吐肺腑，我們更要求中共能開放言路，使和平運動能在中共區域發出正當的反響。

和平運動既是客觀的需要，為什麼沒有得到成熟的果實，這完全因為兩方面主觀的成見，全盤抹殺人民的福利。政府沒有肯反省，這幾年來的失政，使人民受了多少大累。中共沒有肯覺悟，他所實行的完全是殺人自殺的政策。從他們兩方面主觀的論證，都認為有消滅對方的充分理由，因此船頭就始終並不擺來。一個自認為正統，一個自信有革命的權利，所以談的時候還在打，打的時候還想談，這兩套矛盾的邏輯，真是誤盡了天下的蒼生。

當然，和平運動的困難，不僅僅在打破兩方主觀的成見，而更在於解開許多實際問題的僵局。從表面看，前次和談的破裂因為國民代表大會之召開以及憲法的通過，而真正的癥結，還在一個主張軍隊的國家化，一個主張地方政權的自主，中共之與紅軍相依為命，那是事實，不問這個事實的合理不合理，中共視紅軍為其生命線，那是沒有問題的。至於地方政權的自主，無異承認中共已得的地盤，並坐而使中共得根據此地盤以漸謀傾覆對方的政權，不問兩方面所舉出的理由是怎樣正當，但在共謀妥協之際，一舉而擊中對方的要害，總是使和平的理想益為遙遠。

其次，國民黨內部的不統一以及政黨的腐敗，使他不致有和平的決心。按常理推論，國民黨是政府黨，一切佔有優勢，無論他對中共作怎樣的讓步，總可以控制中共而有餘。至目前為止，中共雖然是有力的反對黨，但尚不能與英國的保守黨或美國的共和黨相提並論。中共祇要放棄革命的行動，對國民黨總是有利的。兩黨的黨員，相差極多，在選舉時應該國民黨有利。國民黨所統治的區域，較之中共的為廣大為肥美。能和平就是能保持現狀，而保持現狀當然是國民黨的幸福。但內顧實際，國民黨內有派有系，而派系之爭，並不比黨爭稍為遜色。所有的黨員，消極者多，積極者少，黨的實際力量，薄弱異常。講到對於統治區域的控制權，也如因政治之腐敗而發生動搖，因此之故，國民黨對於和平的後果常存戒懼之心的。

反過來看，中共常認爲和平運動是種陰謀的反動，在中共的理解之中，國破民窮是他成功最好的機會。他雖然也做過和談的姿態，但傾覆現狀的意志是非常堅決的。從馬克斯的辯證法，從列寧的革命哲學，都證明人民的貧窮是對於革命行動的。悲天憫人爲民請命，這是中產階級腐化的感情。因此，我們爲貧窮爲疾病而發出的哀號愈是響徹天霄，他傾覆社會的決心愈是堅定。白骨壘壘血肉磨糊，在我們是可怕的恐怖現象，在他却要在這上面建築革命的基礎。

中共的看法，既確定這個時期是爭取統治權最好的機會，所以把和平運動就看作阻撓他成功的策略。他說和平徒使國民黨得以苟延殘喘，而長期的休戰，甚至使國民黨可以恢復其統治的能力。爲了這種種關係，中共所採取作戰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自政治經濟社會以至軍事，無一不希望對方以致命的打擊。縱使軍事上的攻勢可以停止，對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總不肯採和平的方式。就是軍事攻勢這一點，也始終用避重就輕的策略，使戰爭能延長下去。一個自認爲革命性的政黨，他所採取的路線往往是這樣的。但中共亦有其與衆不同的地方，即是以暴力却持羣衆。以破壞造成破釜沉舟之勢，凡是和平方案之違反此兩項目標者，他一概不肯予以考慮。

因此，我們相信：國民黨對於和平運動實在抱兩可的態度，祇要能保障他和平以後的優勢，他未嘗不願意協助和平運動的成功。而中共則非至革命完全成功，決不願意聽見和平兩字。這是我們一年餘來所以失敗的原因，也是四萬萬五千萬人所以還背着內戰的十字架的原因！黨與黨之間，不肯爲着人民的生存而犧牲黨的私利，我們的生命所以就高懸於屠刀之上了。

我們認爲兩方面主觀的成見都是不合理的。從國民黨來說，他這種戒懼之心，應該作爲鞭策自己改進的力量，而不應該因之而冒險求戰。黨的有利地位，完全靠自己的努力，不能勉強旁人予以承認，國民黨主政二十年，是功是過，國人自有公論，宣傳既不能掩飾事實，獨尊亦不能鞏固他的基礎，他應當事事反求諸己，以勇於任過勇於改過的精神來收拾人心。說實在的話，國民黨的統治假使是健全的，中共根本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了也不會有現在那樣的勢力。許多的苛政，許多的弊政，到現在還沒有改革的跡象，無怪民怨叢生而有土崩瓦解之勢。一個已經得到政權的政黨，不能於在任時間表現他的政績，到他動搖的時候又倒行逆施起來，可以說是最不聰明的辦法。國民黨應以待罪者的態度，理智的考慮目下爲國家爲民族應該採取的途徑，豪無疑慮地加以採取，不能再祇爲一黨作打算了。

從中共這一方面來說，自寧漢分裂以後，始終在策動傾覆現狀的計劃。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底於成的把握。尤其這一年以來，證明他的武力並不完全可恃，而人民對他的誤解，反因爲恐怖之蔓延而增加。任何政治家的抱負，應以救援人民爲職志，現在大家的生命在不絕如縷的狀況中，如何還忍心飛舞屠刀？目下的殘局，即以協作的精神共赴艱難，二十年後不知能否稍露光明？倘若再橫加摧殘，則百年之後不知能否恢復元氣？我們不願意先把中國搞成沒有人烟的荒塚，而後再在這上面建立蘇維埃聯邦！

我們這一種呼籲，對敵對的雙方會有發生多少作用，自己亦不敢相信。但是我們的話不是向敵對的雙方說的。我們向無黨無派的人呼籲。打仗所犧牲的是我們的血汗我們的金錢，我們不能這樣永爲魚肉。我們中立的人，應該有自己的主張，有自己的辦法，我們要求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若真正希望和平的實現，我們祇有積極的與敵對雙方取不合作態度。中共統治之下的人民，希望也能在這方面發生一點力量。我們祇有使統治者無可戰，而後戰爭才會真正的停止。

# 論工資政策

馬潤庠

工資在生產成本中，佔最重要一部份，故工資之政策如何，不但直接影響工人生活本身與生產品的成本，而且間接影響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自戰事結束以還，因為幣值不穩定，物價不斷上漲，而政府又無一固定之工資政策，勞資糾紛，層出不窮，在整個社會動盪中之今日，殊非國家之福也。

目前，工資計算之標準，不但各地不同，在同一地域中，亦因各業不同而互異，就上海言，在本年二月以前，各工廠工人工資，都照生活指數計算，南京、重慶、天津、廣州、漢口各地之工資，有按生活指數計算者有按米價計算者（如每月米若干担，照發薪時米之市價計算），有一部份用現金，另一部份則用實物發給者；有按件數計算者，（如成衣匠之工資）；有按營業盈餘分紅者（如理髮匠之工資，係按營業盈餘，與僱主共分，或工人佔四成，僱主佔六成，或工人佔三成，僱主佔七成不等）種種色色，不一而足，複雜異常，以致遇有勞資爭議，政府調停其間，殊乏一合理之標準，此實有待於改正者也。

然則，工資計算之標準，究應以何者為依據？在未解答此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明瞭工資政策之目的何在，然後再檢討現行計算工資之方法，看其是否能達到我們所預期之目的。工資政策之目的，一方面須能安定工人生活，同時又須能維持社會經濟繁榮，在正常的經濟狀況之下，這兩個目的，並不難達到，因為工資標準之決定，祇要其不過份提高生產品的成本，使其銷路減低，弄到不能支持的話，不妨盡量提高，因為工資增加，足以增加工人的購買力，又因為工人就是工業製成品的主僱，其購買力增加，工業製成品的銷路自然增加，廠商直接受益社會經濟，也就因是繁榮；反之，如工資之標準，定得過低，工人購買力減少，衣食尚虞不給，自無餘力去購買其他必需的物品，貨物的銷場因是受阻，而經濟的繁榮，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為這個理由，所以，在平時，工資的標準，不能定得太高，也不能定得太低，否則，就是以妨礙社會繁榮。

以上所述的工資政策之理論係指在正常的經濟情況之下而言；現在吾國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無已，工資政策的目的，除了安定工人生活之外，還要以不大量的增加通貨流通，因而刺激物價為原則，本年二月六日政府頒佈之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凍結工人工資，規定各指定地職工之薪金，其按生活指數計算者，應以本年一月份之生活指數為最高指數，其目的，就是希望借此減低生產品的成本，藉以安定物價，這方案的理論基礎就是認定工資為生產成本中最大的一部份，工資增加，即等於生產品的成本增加，在另一方面，如生產品成本增加，廠商一定將製成品的售價提高，以資取償，故工資增加之後，物價一定上漲，物價上漲之後，工資又跟着上漲，彼此互為因果，循環不已，在通貨膨脹到了現在的一個階段，工資增加一分，物價即上漲十分，物價上漲，貨幣的價值更加跌落，政府的支出必定增加（因為購同樣物品須付更高的價格），貨幣的流通量又跟着增加，幣值再跌，物價續漲，結果，必至不可收拾。所以政府凍結工人工資，目的在安定社會經濟，用意是對的；不過，自從這個方案施行以來，已經有四個月，物價不斷

上漲，就上海一般主要物品的批發價而論，一月份之指數為六八六、八三三；四月份之指數為一、三八七、一〇九，四個月之內上漲了百分之二〇四，換言之，四月份工人之實際收入，與一月份相較，減了一倍以上。在百物狂漲聲中，糧價的上漲，更加駭人聽聞，就南京一地而論，在四月二十二日中等熟米每担售價為十二萬元，到五月七日，已漲至二十一萬元，為時僅半個月，上漲了百分之七十五，在這種情形之下，凍結工人工資，是絕對不合理的，各地工人團體，紛紛要求將生活指數解凍，政府為了保障工人生活，同時又顧慮到解凍後對一般經濟的影響，所以擬定下列的折衷辦法，即日起開始實行：

凡工人薪給在卅元以下者照指數十足發給，自三十元至一百元之階段，分之八級，百元以上至三百元分為兩級，該項方案之指數折扣表如次：

第一段 (自卅元至一百元計分八級)		第二段 (自一百〇一元至三百元分二級)	
基薪	折扣	基薪	折扣
三十元	十足照指數發	一百〇一元至一百五十元	六折
三十一元至四十元	九五折	一百五十一元至三百元	五折
四十一元至五十元	九折		
五十一元至六十元	八五折		
六十一元至七十元	八折		
七十一元至八十元	七五折		
八十一元至九十元	七折		
九十一元至一百元	六五折		

以上折扣，採逐級遞減制，例如某甲月薪為五十元者，其三十元之基數，照指數十足發給，自三十一元至四十元間之十元照九五折發給，而四十一元至五十元間之十元，則照九折發給，如資方無力負擔者，得由勞資雙方協議，自訂待遇標準。這個方案實行後，可能有下列幾個影響：

(一) 上海工人工資底薪，普通工人每月約四十元至四十五元，工頭約五十元至六十元，六十元以上者大多為技術工人，在這個方案實施之後，技術工人的待遇減低，普通工人的待遇提高，各級工人工資間的差額減少，漸有平等趨勢。

(二) 就生產方面言，生活指數解凍，陡然增加廠商之成本，而工業陷入更困難之境地，因為多數工廠接受僱客定貨時，其定

價係依照當時之人工（八千倍凍結之生活指數）計算其成本，生活指數解凍後，工資一項支出，頓增一倍，此種情形，尤以小型工廠為甚，因小型工廠多數工人工資之底薪，係在三十元以內，按照生活指數解凍辦法，幾等于無條件解凍，工資成本，上漲一倍，殊出于廠家意料之外，故許多廠家，將因是而不能支持，當局舉棋不定，政策屢更，使工業陷于困難，其結果，將減少生產，增加工人失業。

（三）就整個社會經濟而言生活指數解凍後，工資的支出，突然增加，通貨的流通量，也跟着增加，物資不變，而貨幣的數量增加，物價之再度掀動，自不能免，而且，在事實上，生活指數解凍消息傳播後，原料價格，已經上漲，再加上工資支出增加，工業製成品價格的上漲，自然是避免不了，這更加增加通貨的流通量，跟着又再刺激物價。

由以上三種情形看來，政府這個方案的措施，未能達到安定社會經濟的預期效果，故可斷言：我們再檢討這個方案，是否能安定工人生活：

廠商因工資增加而增加成本，如果是事實上許可的話，必定將其轉嫁于消費者，換言之，就是將工業製成品的售價提高；因為工人本身就是消費者，物價上漲以後，工人日常生活費的支出增加，故實際出入並未增加，或謂工資既然依照物價指數計算，物價上漲，工資跟着物價指數上漲，工人生活並無影響，但是，物價指數的編製，通常是一個月一次，本月的工資是根據上月的物價指數計算，其間相去一個月，在惡性通貨膨脹最後的階段中，物價一日數漲，工人的收入，與物價指數，相差甚遠，故用物價指數計算工資，工人仍是吃虧，其吃虧的程度，視物價上漲的速度而定，如果到了上面所說的情形，物價一日數漲，工人將無法維持生活。由上面的分析看來，用物價指數計算工資，不但工人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而且，還會刺激物價，加甚通貨膨脹，使整個社會經濟，不能安定，故絕不能認為是一個理想的政策。

如果拋棄物價指數的計算標準不用，任從工人與僱主自動洽商，以爭取于工人最有利的工資，這個辦法的結果如何，將視各業的工會實力與團結力的大小而定，如團結力大。工資的上漲率，也許會高過物價的上漲率，這樣，生產就要受影響；其實在重慶，工資的計算，並無一定之標準，在過去數年間，工會的勢力龐大，是以工資的上漲率，高過物價的上漲率（例如：三十三年工資上漲率為二二九；物價總指數的上漲率祇有一五一；同樣三十四年工資的上漲率為三一七，物價總指數的增加率祇有一一三）結果，使工廠多不能支持，生產銳減，據經濟部所編的戰時工業生產總指數，以民國二十七年為一〇〇，民國三十二年增加到最高點，三七五，六，到了民國三十三年就跌到三五二，到了三十四年再跌到三一七，生產銳減就是減少工人就業的人數，造成社會的不安，是以工資提得太高，無論站在工人立場或國家立場都是不宜的。所以，工資的計算，必須有一致的標準，這標準必須容納為一般人了解，故又不能太複雜。

我們在前面的已經說過，在經濟未安定以前，過渡時期內的工資政策，其目的必須一方面能安定工人生活，一方面又不致刺激物價，故最好是用實物配給制度，即工資應包含兩部份，一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一是現金。至于如何掌握這些物資，來配給工人，應由政府統籌辦理，不應由各廠商單獨分頭在市場上搶購，因為這樣也是會刺激物價，其結果與增加工資相同。如果工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到解決，則無論物價漲到如何程度，其生活亦不致受威脅了。



# 人類學在我國邊政上的應用

馬壽長

## 人類學由資本帝國主義羈絆脫離的

### 經過

科學是人類創造的，它的產生和演進與人類的利用有不可分離的關係。人類學是一種人文科學，它的產生和演進更不容易與應用分離。歐洲的人類學不會產生於中古的封建主義時代，而產生於資本帝國主義時代，原因在此。十九世紀，商人的旅行日記和傳教士的會務報告便是當時人類學的主要資料。商人以白種人的尺度審量海外有色人種的體質和文化；以買賣人的態度觀察探獵民族的生活與農牧民族的風俗，所以引起歐洲人的注意，而有「海外軒渠錄」式的人類學出現。至於基督教的教士，比較商人自然要少勢力些，但它們却不能沒有偏見。它們以為基督教義是神聖無上的，其它非基督教的信仰都是巫教魔術的偶像崇拜。它們相信單偶婚制，私有財產制是人類天經地義的制度，因而以文明人自居，而排斥多偶婚制，集體產業所有權為野蠻人制度。一直到最近英帝國的 Westermarck 仍由此觀點寫成人類婚姻史巨著，在歐洲風行一時。所以這一時代的人類學距科學的水準太遠，和我國清末小方壺齋所收軒的各種土著記載比較，只算多一種合理化的解釋罷了。這時代的人類學，無以名之，只可名之曰「蠻族學」(Barbarology)罷了。

但時代是進展的，人類學亦隨時代而日趨開明。十九世紀人稱為政治上的民族主義世紀和學術上的科學復興世紀。歐美人由於民族意識的醒覺，與渴求團結和自由的結果，所以產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凡爾賽會議決定了民族自決的原則，即承認每個民族有形成一獨立國家之權。但凡爾賽公約的規定是非常模糊的，國外的弱小民族和國內的少數民族是否仍為一民族單位呢？並無明文規定。因而在此階段上的人文科學，被分裂為政治學和社會學是研究獨立民族或列強國家的組織之學，而人類學的研究主要目

標為史前的先史人與現世的弱小民族和小數民族。這種學術的分工，雖然於研究上是方便的，但無意中把人類分為二種：一種為初民或原始民族 (Primitive people)；一種為文明人或文明民族 (Civilized man or People)。甚而把文化亦分為二種：初民只有文化 (Culture)，文明人始有文明 (Civilization)。試問用什麼尺度區別人類的種類和文化的樣式呢？沒有別的，白種人的技術文明便是這種分類的最高準繩。白種人是蒸汽力、電力和內燃力的發明者，由此而發展為列強，為帝國，為資本主義。換言之，即凡為列強帝國而具有資本主義條件的民族為文明民族；反之，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和少數民族則為原始民族。於是人類學成為研究弱小民族和少數民族的科學了。

凡爾賽公約還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即注重民族集團，而忽視個人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地位。因而一種民族得勢了，不只壓迫國外弱小民族和國內少數民族，甚而壓迫國內以及國外任何不同意見和不同文化的個人。否認個人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極權主義之反抗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大戰的結果主要是民主觀念中人權綱領的產生。人權和民族種多少帶一點對立性的，人權綱領為民族主義的修正乃此次戰爭最大的成果。一九四三年英國 E. H. Carr 計劃和平草案時，於其和平之條件一書中說：「國籍與自決是指同一事件，如果一個人有二個客觀的區別之點，即或為波蘭人，或為南斯拉夫人，他願意作一波蘭的公民固可，作一南斯拉夫的公民亦無不可。」此一原則成為戰後人權綱領的主要成分。在這裏人類學跟着時代要變了。美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近年逐漸放棄 Primitive Society 而試用 Folk Society 一辭，可以表明這種改變的傾向。「原始的」一辭實在是不科學的，它們既然反對進化論派，便不應向人類之原始的和究極的二個頂點上轉彎。現世民族並沒有歷史區別的觀點在內，只有先史民族才可叫作原始民族。無論白種和有色人種都是人，列強國民和

種小國民以及統治民族和少數民族都是民。Hobbes 便是上述各種人民的概辭。人類學應當是研究人民及其文化的科學。人類學的原則可適用於弱小民族和少數民族者自然亦適用於列強的所謂文明民族。無論如何，人類學不當浸淫於蠻族學或弱小與少數民族之學的領域中了，應當開拓到人類全體及其文化的整個領域之上。

## 二 英美荷澳諸列強之應用人類學的實施

我們如謂人類學為十九世紀資本帝國主義的產物，即今日之應用人類學乃二十世紀列強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矛盾的產物。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已經法國革命以來最流行的口號了。兩次世界大戰爭以來，又多了一條民主的口號。國內政治是照這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邁進的，但對於異國民族以及本國殖民地內的少數民族却不敢提自由平等民主。此乃政治制度的矛盾。同時，若干國家，如英美，在政治上是提倡民主，乃至實行民主的，所以在理論上他們十分同意殖民地的民族自決，民族獨立。但在經濟上，無論國內的與國際的，始終建設於資本主義之上，爲了攫取工業資源，爲了覺得商業市場，所以不但不能放棄殖民政策，還須進一步強調之，調和之，彼此勾心鬥角地在變態地攫取殖民地帶。此豈非列強國家之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中間的一大矛盾？現在民族自決運動在世界上每個弱小民族領域裏策動着，進行着。誰是策動這種運動的主力呢？不是蘇聯，亦不是土著民族自己，而即是列強各國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和二十世紀的民主觀念之餘波。所以說策動殖民地民族自決的便是殖民地所有者的列強。因此之故，美國不能不承認菲律賓獨立，英國不能不預允印度自治。但菲律賓能算獨立，印度果能自治嗎？我們可以乾脆地預料，在英美放棄其資本帝國主義之前，決不會讓它們的殖民地真正獨立自治的。政治的民主可以讓殖民地人民直接統治到間接統治，由壓迫統治到委託統治，甚而可以允許他們自治。但經濟的資本主義和這一套政治實施根本是衝突的。經濟不能獨立實爲殖民地政治不能獨立的主要原因。如何調協這種不調和的場面呢？政治學和經濟學於此束手無策了，這時乃請熟習殖民地情況的人類學再作最後的調人，於是便有應用人類學的產生。應用人類學是利用人類學的原則，觀點，方法，以及知識於帝國殖民行政上的一種技術科學。

在列強裏，英帝國的殖民地最多最廣，因此應用人類學在英國最爲發達。在一八九六年，英國學者 E. W. Smith 創設帝國民族學社 (Imperial Bureau of Ethnology) 搜集資料，曾自許「於科學及政府有重要價值」。其後，遣派人類學家赴諸殖民地區域考察，如 Malinowski 等之於南非蘇丹； Elkin 之於澳洲西部南部； Chinnery 之於新幾內亞； Firth 之於金海沿岸； Meek 之於尼吉里亞； Huton 之於印度，皆於各殖民地之政教經濟風俗洞悉無遺。英政府設有殖民局 (Colonial Office)，內分設各種委員會，指令各大學作各種殖民問題的研究，同時又在各大學設殖民地官吏訓練班。如在牛津和劍橋二大學規定人類學爲殖民地海陸軍候補官兵必修課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與倫敦教育研究所皆開有殖民地官吏訓練班。阿伯丁 (Aberdeen) 大學設有宣教殖民計劃局。皇家人類學會設有專門委員會討論國家殖民地問題。羅德斯立文斯頓中非研究所 (The Rhodes-Livingston Institute of Central African Studies) 爲一九三八年所創立，由政府補助下進行羅德細亞及其中非英屬地帶之殖民問題。同年倫敦組織非洲語言文化國際研究所研究二個那色蘭部族 (The Nyaland tribes) 的營養問題。並在 Malinowski 指導訓練許多青年學習，送往南非服務。又有種族關係研究所設在南非，專門研究南非人種與白種人的關係問題。總之，英國政府是與本國人類學家是儘量合作的。各殖民地政府普通皆有人類學專員之設。它是殖民政府的顧問，同時又不斷進行研究，以其意見供獻給政府。

美國的殖民地雖少，但人類學與殖民行政的合作未嘗或怠。在菲律賓，Foster 教授等研究該島的土著部族並設計改革計劃，幫助該地政府進行人口調查，並予以說明。在美屬沙毛亞島上，由人類學家 G. G. Brown 計劃，以巴斯陶 (Barotac) 紀念基金創立一實驗學校，與當地海軍長官合作訓練土著貴族子弟，使其將來成爲理想的領袖。美國本部設一太平洋關係學會，雖爲一私人組織，其研究主題則爲美國及其領土之應用人類學的研究。耶魯大學，海威夷大學，以及其他大學都集中於殖民問題的研究。新近亦有「應用人類學社」，主要興趣在於殖民行政的研究。關於國內民族的研究和實施機關，有印第安事務部 (Office of Indian Affairs) 和農業部的推廣局 (Extension Division of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都

是致力於應用人類學的研究，確有相當經驗，可以推行於殖民區域的。此大世界大戰，美國人類學為本國兵士著有生存法 (Survival) 一書，教導它們在陸上，海上，刺林，兩極地帶如何能活。同時，若干專門人類學家直接參戰，主要任務在集中視線於殖民地前線的研究。其報告如「人的管理」(The Government of man) 即為已經出版的一種。

荷蘭亦為擁有殖民地較多的國家，在萊登大學 (Leiden Univ) 和烏特來希大學 (Utrecht Univ) 設有人類學的訓練機構，專門訓練派往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官吏。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四年派了許多考察團到東印度羣島和其它殖民地，研究其語言與文化，尤其東印度的習慣法為荷蘭所採用，為制定民法之基礎。荷屬京都的殖民研究所 (The Colonial Institute) 致力於殖民地土著的研究，最為馳名。

澳洲於一九二三年舉行太平洋科學會議，決定應用醫藥科學和人類學的原理為保衛土著種族為當務之急。前此不久，澳政府在巴布亞設有政府人類學家 (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由 F. E. Williams 充任，直至一九四三年死亡而止。荷蘭已故的 H. Murray 總督常宣稱它的行政乃「建設於科學的人類學原則之上」。由於如此，澳洲的石器時代的土著因而始能跨進文明的初階。一九二四年荷蘭又設一政府的人類學家於新幾內亞。各地海陸軍官佐，每隔二年必送澳大利亞的麥奈大學 (Monash Univ) 受社會人類學和行政人類學的訓練一次。雖先任將校亦須上班訓練教以特殊的課程。

此外，如法國、比利時、德國都有或多或少的人類學與殖民行政的配備。殷鑑不遠，日本在佔領我國東北各省期間，研究東北經濟資源的有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滿洲經濟社，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大連滿鐵社員會，日本東亞開拓社，日本生活社。研究地理，語言，民族以及文化的，有滿洲事情案內所，研究一般社會情狀的，有滿洲日日新聞社。上述諸研究機關，都由日政府支持的，雖然不是純人類學的應用，但有不少的人類學家參加在內。

### 三 中國邊疆的特質與中國民族學的建立

中國邊疆有異於列強殖民地的性質，綜括有下列各種特點：

第一、中國邊疆並非中國的殖民地，換言之，即中國只有邊疆，沒有殖民地。中國一向以農業立國的，農業國家根本無殖民地的需要。但農業國家是重視土地的，因而疆域的觀念特強。在歷史上，雖然不乏征務英域的皇帝，但它們的主要動機，與其說是為拓土移民，勿寧說是安民保護。中國北方兩方一向與遊牧民族為鄰，在民族學上只見到牧民是侵略的，農民是安分守己的。因此，我很不同意拉鐵摩爾 (Latrobe) 的意見，說中國古代是漢族侵略戎狄。中國為了保固邊疆，曾經費了無數的財力和人力，結果，不只沒有取得什麼，一直到現在，中央仍以中原地區的財政補助邊疆政府的開支。中國沒有資本主義的工業，輸入邊疆的只有手工業的產物和由外國所輸入的洋貨。邊疆的土產，除數目貧乏的可憐之黃金一項以外，它如麝香、貝母、豬羊毛之類，主要原是輸出外國。邊疆土地，九石一土，農業之價值極微，因而中原人之在邊疆者只有商人苦力，很少有計劃開拓農田的農民。因而，中國始終是沒有殖民地的。

第二、中國人的開拓東北是以勝國農奴的身分爭取生存的，經營南洋是以窮而無告的苦力姿態博得贏頭之利而奮鬥成功的，與今世列強之以資本為手段，武力為後盾的殖民運動根本異趣。而且，中國移民所至之處，只有專業的組合，而無政治的力量，故移民區域，除少數地域如東北外，其餘廣佈中國民族之處，皆非中國的領土，這些領土反而成為後來居上的列強之殖民地帶。

第三、中國不只沒有殖民地，反而中國自己是列強的一個變形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一個類似於殖民地的國家當然不會擁有殖民地的。今日中國的邊疆民族，可以說是一些少數民族，但僅僅於人口多寡之上有一點少數的意義罷了。若由統制者和被統治者，顯隱者與弱小者的對比而言，邊疆民族之為少數民族則須加以時代的限制了。五胡亂華時代，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邊疆首領都曾統治過中國北方人民。蒙古人和滿洲人都曾統治過中國人民的全部。今日的漢人，在三十五年前，是作中國的少數民族的。現時，若中國真能民主，則中國民族一率平等，其中應該沒有多數與少數之分。

第四、中國今日所關的邊疆問題，我們當認識清楚是內政問題，不是民族問題。我們的政治不健全，內部不修明，自然會引起邊疆的反感和叛

邊區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中國文化的邊際。比長論短是一般人民的心理。中原人民當其感覺政治苦悶之時，尚且走胡走越，何況處於中外文化交流地帶之邊民？一部二十四史告訴我們，中央政治有辦法的時候，邊疆人民一定是向心的內附的。反之，邊疆人民一定要離心的外傾。封官拜爵不過是治標辦法之一種罷了。治本之道仍在於修明內政，安定社會。

第五、現代歐美的殖民行政問題是民族間的接觸問題和文化間的接近問題。但中國邊疆這些問題應當是過去了。因為中國民族早經接觸，中國文化早經接近。所差池者為接觸與接近之間沒有開明的指導和科學的方法罷了。

因為上述種種原因，因而提醒中國的民族學者和人類學者及早建立中國的人類學。人類學是一種既為自然科學又為人文科學的綜合學問。它在自然科學中與人物學最為接近。但生物學本身，與純理的數學以及無地域性的理化科學不同了，它開始有建立為中國科學的可能。自生物學以上，所謂超有機的社會科學，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乃是其中的一部，更有建設為中國科學的可能。文化原有普遍文化模式與特殊文化模式之分，社會亦有共同社會與社會之分，心理亦有人類通性與人類個性之分。前一種是人類可共同的，後一種是因地因時而異的。中國的人類學，固然不能放棄人類所共同的一方面，但尤須注重中國人獨有的一方面。此為吾人提倡中國人類學或中國民族學的基本理由。

#### 四 幾種人類學的原則可為吾國邊政之借鑑者

歐美科學傳播到中國以後，我們必須明瞭一種科學幾種應用的道理。自然科學如此，人文科學亦然。歐美的應用人類學只利用人類學的一部分原則觀點方法和知識以為控制殖民地的技術，顯然對於一般人類學的原則未能大量的應用，所以結果仍然不免出主入奴的弊病，科學為野心帝國之奴隸而已。中國邊疆與帝國殖民地既不可同日而語，故中國邊政於人類學的應用不當限於應用人類學，而且尚修正應用人類學，於此科學之廣泛領導中尋求適合於中國邊政的特殊情況。

(一)「人類唯一，文明則殊」的觀念初為美國的 F. Boas 所提出，

應用到中國邊政則吾人必須基本承認中國民族屬於一個種族，然而仍有滿、蒙、回、藏、苗、族之分者仍由於文化模式不能僥同之故。

(二)文化的價值是相對的，非絕對的。一種文化有一種功能。B. Malinowski 謂：「文化是人類的必需品，用以克服環境，保衛個人，繁殖種族的」。文化的不同，或由於環境與歷史的不同，或由於文化演進的遲滯 (Culture lag)。因而文化不齊是非常自然的一種現象。一個民族對於自己的文化大致都有「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心理，實在由於弊帚自有其弊帚的功能。演進論派所謂「遺說」(Survivals) 的概念似多為異民族對於本民族的看法。遺說未始沒有其功能的。所以，估量文化的價值時，當以本民族的生活為其首要的尺度。例如「月會」和「日曆」便是與生活相適應的產物。藏曆不必改為漢曆，一如陰曆不必改為陽曆一樣。羌民每逢戊日便假一天，我們何必一定用日曜日去代替他們的逢戊假期呢？必要的改革則不必改革。唯有土著感覺到的改革，然後順勢改革之，然後始可稱為「科學的控制適應」。

(三)文化是變動的，即文化動力說 (Cultural Change) 經功能學派之提倡已成一為理論的體系。一切民族無日不在變動之中。但強迫的變動不如自願的變動為有效，則顯而易見。土人在沒有良好理由和真正努力是不願放棄其傳統的辦法的。由於自覺始能自動。治邊者與其作行動的提倡，莫如作觀念的提醒。故教育的提倡乃是一種治本的辦法。什麼是良好理由可以引起邊民的自覺呢？簡言之，即對於邊民生活有實惠的利益是也。過去，中國政府對於邊疆的投資，都投在政治上，很少投資在經濟上，以此邊民對於中央的各種改革始終是懷疑，觀望，反感，厭惡，反抗，其主要原因在此。

(四)順勢利導是改革邊制的首要方法。民族行政人員的行政態度第一要容忍，承認民族文化的多元主義，相互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極力表現各民族文化的優點。優與劣的對比自然會形成相形見絀的或彼善於此的事實，此為甄別文化和改革文化的最好機會。第二，發展邊民自己的生活之道，強於灌輸一種外來的方式，以圖原來的生活改型，再事發展。第三，運用禁止方法和取締方法不如用代替方法。例如新幾內亞土著於結婚前有獵首之俗，原為表示新郎之忠誠與勇敢的，後由人類學家建議以獵首代

替人首，故相安無事。在巴布亞，提倡以足球代替矛箭為解決團體間的糾紛。以家代替人為犧牲以祭谷神。我國古代相傳諸葛亮向南蠻提倡以饅頭代替人頭祭祀，與此原則相同。

(五) 進行邊政之首當注意者為不妨害邊民生活之基本安全。邊政是改善邊民生活的，如果損及生活的安全便早失却邊政的意義。邊民叛變的暴力和其生活安全的損失是成正比例的。在它們看來，生活實重於邊政，在人類學的觀點看，此種想法是近於真理。

(六) 邊民心理並非「前邏輯的」，或「不邏輯的」，所不同者由於他們的邏輯範疇與我們的不相同而已。邏輯範疇不同，因而信仰不同，制度各異。

(七) 最後一個人類學的原則應用於邊政者即行政人員，相時而動，

生活叢談之一

民主的生活

民主的生活

現在一般人為饑寒與凍餒而掙扎着。為了自己，為了兒女，每個人總是不惜任何手段——偷竊或掠奪，不惜任何形式——乞憐或求化，凡可以達到足衣足食這個目的者，往往心安理得地加以採納了。生存競爭的尖銳化使各人忘掉道德的標準，所以這個時期來談生活的方式，實在是迂而且遠的。

有時候我又不這樣想。眼看很多貧困而能自勉的人，他們的頭頸骨並沒有軟下來，他們生活的方式，甚至較高貴的人更可以令人欽敬。因此我又覺得生活的方式，不一定國泰民安的時期才可以談得，就是兵荒馬亂的世紀，談話亦並不妨事。我們不能高舉藝術的生活，所以也談不到生活的藝術，紅袖添香是可望而不可求的，茶道又講究不起，祇有平凡的生活，

最為重要。積習很深的西洋人對於工作效力的測量是以時間計算的，所以動輒來一五年計劃希望引渡石器時代的人們到了文明。同理，漢人以農業工商業人的心理去審測邊區的遊牧和狩獵文化，不是估價太低，便是矯枉過正。其實，文化的歷程是慢動的。尤其是土著人的行動速率是由長期集體會議，禮貌的等待，以及神祕儀式的卜卦決定其前途的。行政者一定要從容的等待，內心著急，而外貌仍須寬容，等到邊民心理上贊成行動機，也許事半功倍，便意外的成功了。但普通一個計劃，在我們須以年月計算的，在他們須以十年、二十年甚至一代、二代的計算。太平洋南部的毛里人(Maoris)對於行政經驗會有一字供獻，即「patihao」，政策，原義是「有目的不動」，和中國黃老之學的「無為而治」是同義的。

鄒文海

正是我們一天一天過着的。這種平凡的生活，我們未嘗不可以使它更為合理，更為有意義。

有一種生活，我想稱它為民主的生活，這是平凡而極有意義的一種生活。許多人以為民主祇是加在政治身上的形容詞，實則民主是各方面的，思想可以民主，社會組織可以民主，而生活也可以民主。所謂民主的生活，就是把自由平等博愛以及負責任各種精神充沛於各種行動之中的一種生活。美國有兩個著名的大總統，華盛頓和林肯，他們的私生活都是頗足稱道的。誠實的華盛頓，他幼年時期不肯誣騙他父親的故事非常膾炙人口，熱心腸的林肯，從泥溝中救起一匹母豬的故事也異常生動。這兩個故事，無非表示這兩個偉人能有民主的生活。誠實是平民的美德，祇有貴族才用欺騙的方法愚弄他人。熱心腸就是博愛的精神，而博愛是民主的，與貴族的捨施不能併為一談。其餘受廣大羣衆愛戴的領袖，莫不有容易與平民接

是氣質。邱吉爾與阿特蘭相比，很容易使人覺出兩個人生長於兩種不同的社會之中，前者多少有傲慢的性格，而後者則非常平易近人。

類似的例子可以舉出很多，證明各人的生活方式的確可以屬於兩種不同的類型。但是我無志於做一個民主的倫理學家，這一種分析或整理的工作還是讓給後人好了，我現在所談的，完全是無系統的隨便談一談我們的日常生活民主與不民主兩種方式的區別。

個人的生活，最大的活動對象是家庭。而在家庭之中，夫婦以及父母子女的關係，實在可以有民主與不民主的分野。就拿夫婦來說罷，好多新式的家庭已經以親愛的來稱呼對方了，但是這「親愛的」三個字，是否能裝飾民主的夫婦生活，我認爲未必。「親愛的」亦許象徵着男女的平等，最少，以「親愛的」相稱的那一對配偶，與夫人相公相稱的時代究竟不同了。現代的所謂新式家庭，大多建立於男女平等的原則之上。因之，能稱對方爲「親愛的」這個丈夫，大體上不至踐視他的妻子，他對於妻子，大概總是以民主的面目來相處。不過，所謂新式的丈夫，又並不能處處地方民主的，他們對於妻子的職業，大多不樂意允許。有的認爲獨立的妻子要減少家庭中和怡的空氣，有的認爲獨立的妻子要放棄她對於兒女教養的責任，有的乾脆說願意他們的小婦人在廚房中做出精緻的點心來招待客人。在這種種響亮的理由之後，丈夫很少考慮妻子的個性和志趣。我並不主張女子一定要找職業，但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當解決，實在是女子自己的事情，丈夫決不能以自己的意思去替妻子決定。丈夫所聲述的種種理由，祇是丈夫的而已，妻子可以加以考慮，但並不須作爲決定的惟一原因。

在中國社會中，丈夫本位的色彩還異常濃厚。夫爲妻綱的治家格言，雖然沒有人直接提出來過，但有形無形之間，我們總是在製造少奶奶式的輕體動物。縱使現在謀生不易的局面，許多人還不肯放棄供養少奶奶的理想。就是在美國，夫婦之間的關係一樣是不很自然的。時代的前進（電影新聞）中說明美國妻子會因與勝利夫人競爭而消耗了大量的化妝品。這個事實，證明美國的丈夫處於有利的地位。女子爲博取男子的歡心，就不得不依賴許多香艷的東西了。

要做一個民主的妻子更難，因爲民主常常使愛情缺少保證，男子蠢動的野心，使他的妻子不能提防着種種可能發生的變化。因此，妻子雖然

沒有出動特務來監視她的丈夫，但比較的總是採取監視的態度，有時甚至要偷偷檢查丈夫往來的函件，檢查丈夫所得到的禮物。從這一點說，我們還沒有離開紅樓夢的時代，平兒的精髓在若干家庭中依舊在重複的演出。尤其有了風流自賞的夫婦，妻子更是日夜不能安心。即使是多年的仇讎，丈夫的地位假使青雲直上起來，妻子真是有說不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心情。大部分的女子，不得不曲意迎合丈夫的意志，使得夫婦的感情，不至因年齡個性等等而發生裂痕。現在一般人都說女子是美麗的性別，她們溫柔而有忍耐，天真而多感情，其實這都是環境所造成的，也可以說是女子爭取一點地位而付的不幸的代價。

儘管許多偉人的逸史記載着他們常常有權內之辭，這並不足以證明女子已能控制男子，相反的，這仍證明女子不能有平等的地位。真正尊重女性的人是無所用其權內的。所謂權內的人，通常把女子當作珠寶一類的珍品去加以愛惜。所以被權的對象，假使她富有靈感的話，嚼的亦不是可口的滋味。

我不相信現代的夫婦關係已盡了民主的真諦。尤其中國的社會，一般人的習慣離開這個標準更爲遙遠。許多提倡愛情第一的青年戀愛者，或者根本認爲民主的夫婦關係是不通的。夫婦是感情的融合，雙方已經完全摒除利益的觀念。這樣崇高的羅米歐和裘立葉實在不是在我討論範圍之中的。不過其餘帶有人間煙火氣的一對一對，我的話是可以考慮的。一個想在政治上表示民主作風的人，對於他親愛的太太還不能民主，事實上大大可以加上問號了。我們想建立真正的民主國家的人，對於這一點也大大有討論的必要了。一個對於太太的裝飾以及嗜好也要加以主觀的批評而並且橫加干涉的人，很難對被統治的人作民主決定的。

其次講到父母對於子女，一般的更難採取民主的方式。亞歷斯多德會說：父親對於子女是個開明的君主。我們與亞氏相去已經二千多年了，不幸是這句話還發生異常的效力。做父母的常常憑藉望子成龍的理由，毫無理由的摧殘兒童正在發育的心靈。他們總是說他們的責罰是善意的，但是這種善常常發生最壞的結果。一般的父母，即使在生存競爭中自怨是失敗分子，但對於子女却一樣要發展他們的領袖欲望。他們指定這個或那個做模型，強迫兒童去勉強學習，到他們支配欲得到滿足的時候，兒童的



精神早已是殘廢的了。不問是高等的或低級的家庭，父母對於子女的面目大概是相同的。冷若秋霜這四個字，頗足以形容一般做父親的面孔。做母親的面色要溫和的多，但一旦認為必須教訓一下的時候，態度也就完全相同了。

做父母的說要對子女講究自由平等，一般人一定認為是奇談。其實兒童的個性，一樣是應該尊重的。兒童亦有其喜怒哀樂，雖然他們的所以喜所以怒所以哀所以樂不必與大人一樣，但是這種感情的不容傷害還是一樣的。我們能明白這個道理，父母與子女就未始不能講究自由與平等。不自己個性去支配子女的感情，不以自己的感情去支配子女的感情，這不

是與子女講求自由平等是什麼？我常常看到一對不幸的夫婦，因為自己心理上的重壓，由是對兒女天真的歡躍都加以禁止或斥責，兒童無名的悲哀，都是這種不合理的舉動造成的。二十世紀的兒童，就是這樣很早染習到專制與獨裁的氣味。

教育原理是教育專家的事情，我們不能每個人都深知其中奧秘。但每個人都是要做父母的，假使每個人多從民主這方面設想，那他們對於子女的態度自然應該有一點改變。現在我們都是因做父母而得到了發展支配欲的機會，這證明大家還沒有肯作民主的父母罷。

## 我對於中國民主的看法

呂克難

中國需要民主，中國必須民主，民主無疑是中國今後的前途。民主是一種政治方式，一種社會生活，概括而言，是一種文化樣式。現在大家喊民主企求民主，而民主依然滯留在口號階段。民主怎樣方可使之實現，籠統一句話，要靠人民的覺醒和奮鬥；近二十年來，國民政府的訓政，未始不想把蒙昧的人民喚醒，國民黨每一次全會，莫不申言「還政於民」的初衷，可見國民黨也有一番宏願要實行民主的。但宏願是宏願，事實是事實，兩者不可混為一談。政黨所以能代表人民執政，根本是一個「信」字，正如銀行的鈔券錢莊的期票，它之能流通市場調劑有無，亦是賴「信」一樣，而「信」之可賴，則在於能夠隨時兌現或定期兌現。國民黨一黨執政的局面，一拖二十年，為時實在不能說短。英國的政黨如無巴力門（Parliament）的不信任投票，只有七年壽命；美國的政黨上台期間，僅僅硬性的規定了四年，如果艾德禮和杜魯門想施展他的抱負，就必須在這法定時間內擱點顏色給人民看看，叫人民相信他們動聽的理想。並非烏托邦（Utopia），人民若是信得過去，到時候自然再選他的票，否則，當然請他下台。要之，在民主國家，政黨的得失，政綱政策（主義）如何固然重

要，信用如何尤其重要。因為動聽的計劃只要有一付聰明的頭腦就可設計，凡政黨皆能為之；變優美的理想為現實的生活，這纔困難，在政黨政治的國家，每個政黨都會提出最響亮的主張，但人民並不會因其標榜的五光十色而目迷神眩，經過其審慎的選擇，不行的黨仍舊上不了台，縱使僥倖執政，到期還是垮。好像杭州的張小泉剪刀店，招牌全是一樣，貨色則有好壞，但老杭州者都知道大井巷的張小泉是真的，其餘均是冒牌，外來人不明底細，難免不被「創黃瓜兒」，但吃虧不過一次二次，日子久了決不至再上當。今天的國民黨，論主義論政綱政策，的確不失為一地漂亮的金字招牌。三民主義適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其民生主義，更富有光輝遠大的理想，所以象徵全國民意的國民參政會，能毫無保留地通過「確定三民主義暨國父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抗戰建國綱領總則），連一向作為國民黨死敵的共產黨，亦曾聲言「願為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見該黨二六年九月十二日「共赴國難宣言」）但好的理想與好的事實不能混為一談。嚴格而論，思想是時代的產物，所以孫先生的精神遺產是中華民國的，而非國民黨一黨的，人民不稱孫

先生為總理而頌為國父，其故在此。以人民的眼光論之，國民黨不能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就應該退讓賢路，好在各黨各派都已一再聲稱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作為三民主義正統的國民黨也可以放心得過了。且就情勢而論，今天中國唯一的前途是實行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這即是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青年黨主張民族自立和全民政治，固可包括於民族民權之內，民社黨的國家社會主義，則為不折不扣的民生主義，民盟崇尚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是溫和的社會主義，亦是民生主義。其他小黨派，雖各有標榜，但不致超出三民主義的範疇。我並不打算為國民黨作宣傳，我要提醒有志政治的人：三民主義非國民黨的專利品，非國民黨一黨可長期佔有；他是全中國人民底主義，更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要求；國民黨果有志救國，就應該自認其遲遲擱置三民主義的錯誤，交出政權，讓有決心有辦法的人來實行三民主義。膏藥雖好，不貼不顯其靈。國民黨雖貴為三民主義的正統，但黨員不實行三民主義，金字招牌就只有發生騙人的作用，一如杭州的假張小泉，但人民能永遠被騙嗎？

說到這裏，使我想起了共產黨。在前面談及黨派主張之處，我沒有提及共產黨，這並非我的遺漏，我是有意要留在後面講的。我信仰社會主義，但我却並不同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一般人看來，也許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我恐懼共產主義革命的手段，倒並非我是資產階級，因為我確實一無所有，而是就憂中國這個古老的社會就此一劫不復。民國以來，南北分裂，內戰頻仍，八年抗戰，繼之國共對戰，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指出中國前途不起流血的革命。這裏，必須指出的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政黨，他和國民黨一樣是一個激頭激尾的革命黨。馬克思主義一貫主張以武力奪取政權，以無產階級專政實行共產主義，假如我的認識不錯，則證之中共二十年來在國內的活動，「清算」與「鬥爭」之下，這副慘象，縱第一流的畫家亦將束手浩嘆。我不願為政府作宣傳，從某種程度看，共產黨的發生，乃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其責任依然在政府身上，現在國共混戰，烽火已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照軍事家和評論家的看法，認為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是不可能的，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反過來「百足之虫，雖死勿僵」，國民黨誠然腐化，要

垮塌他亦非易事。所以共產黨如果堅決繼續他的革命工作，則犧牲最大的倒不是國共雙方，而是夾在戰火中的人民。姑退一萬步說，國共雙方鬥爭的結果，一方宣告收場，人民離幸福的日子仍然是遼遠的。為什麼？

現在先假定共產黨勝利，則第一中國的國際環境必完全孤立。英美一向與蘇聯對立，當這時候，必將聯合日本共同對付中國，共黨雖有蘇聯作後台老闖，但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元氣大傷，他自己恢復生產之不遑，除了在政治上道義上支持共產黨的中國外，有效的經濟援助，一定拿不出來。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勢必經過一段極慘烈的破壞（指與國民黨相戰的結果）當其施行蘇聯的故技時，（指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清算），又必遭遇一部份人民的積極抵抗與消極抵抗，而後者尤可怕，蘇聯在革命初期，堂堂主席據說足下無靴，請想，這豈是經過長期的流血戰亂的人民所能忍受！其實這種推斷還是太單純，到那時國際形勢的對立必更尖銳，美國或蘇聯猜忌對方意圖衝破均衡的心理，必致勃發而釀成戰爭行為，這結果不難想像；歷史上第三顆原子彈以及傳說中的宇宙線，將落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自然這是悲觀的看法，但不是無可能的看法。再退一萬步說，上述這些預測都不發生，中國會踏上民主之途嗎？不會的，「權力」。這個東西最有誘惑性，「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如果不是有一套全民共遵的憲法，我敢說，沒有一個政治集團樂願交出政權，孟德斯鳩（Montesquieu）的「法意」（*Esprit des Loix*）不是告訴我們防止專權，要把權力劃作三個嗎，同樣的理由，一個用革命手段拿到政權的黨，因其得之非易，要他交出，情感上最覺困難，職是之故，其留權尸位反而是人情之常，而且愈留戀而不割愛，必愈緊緊抓住政權不放，結果人民必致反對，亦必招致當局的鎮壓，反對愈烈，鎮壓愈嚴，到後來仍然是一個紛爭混亂之局。此種史實，就中國觀之，不論湯武的「貴族革命」，劉邦朱元璋的「平民革命」，雖標榜各殊，其得天下與失天下，總不出兵爭力勝的局面。傳說中的唐虞夏三代帝皇是禪讓的，所以這三代就少動干戈。唯其後來執政權者都是由「馬上」得之。所以中國儘管有孟子的「民貴君輕」之論，而民主政治則依然是在口上說說。外國也是一樣，號稱有民主素養的英國，克倫威爾（Cromwell）的鐵騎一起，議會被解散，終其一生，英國無民主的議論，革命後的共和法蘭西，由於拿破崙的崛起，一切憲政黨規，摧毀無遺



此二人所以能為所欲為，民主若草芥者，無他，即靠其輝煌的武功。近如布爾塞維克（Bolsheviks）之與蘇聯，佛朗哥之與西班牙，政體雖不同，以武力攫取政權並以之控制政權，則如出一轍，所以在這二個國家，沒有我們所想像的民主。中國的共產黨人，一樣要犯一般人所犯的毛病。故一旦共產黨掌握政權，不但不會兌現其一向標榜的民主，也許比現狀更武斷更專制，證之蘇聯革命的史實及其所倡導的民主，我深信這樣的推斷是復可能發生的。反之，假定國民黨勝利，共產黨從此在中國絕跡。在經過

此番苦鬥，反抗勢力消滅殆盡之餘，為未雨綢繆計，政府的措施可能更趨專制；因為經此難關，國民黨會更感政權之可貴，而愈益不願輕手放棄，結果還是一個不了的局面。

總之，民主非一蹴可成，她需要各黨派的相互容忍與相互尊重，因為民主是改良的，要逐漸做去，才能實現。革命誠然徹底，但這除了付出數不清的流血與破壞的代價之外，民主本身將是第一犧牲者！

一九四七、五、二七于江灣。

## 與蔡尚思先生論「國情」

傅瑞華

「貴」順潮流，抑貴合「國情」？這是在中國爭論了許久，而且是具有實踐意義的一個問題。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首先應對這問題求個合理的解答。

關於這個問題，顯然有兩種極端相反的主張：一種是主張「合國情」的，一種是主張「順潮流」的。前者姑以錢穆、馮友蘭為代表，後者可以蔡尚思為代表。蔡氏曾在大公報發表一篇星期論文（註）題目就乾脆叫做「貴「順潮流」不貴「合國情」。他先根據錢馮二氏的見解，替「國情」下了一個定義：「所謂國情便是一切陳陳相因，只能恢復過去，維持現在，不能追求未來。」接着來了一頂大帽子：「主張合國情者，就是反革命者，國情與革命根本不兩立。國情說是少數的實力者，野心者，落伍者，腐敗者最得意而又有力量的一種藉口，其用意與目的全是在乎可以由自己一人，一派，一個性別，一個階層永久包辦獨佔下去。」「順潮流是進化的，革命的，行得通的，合國情是退化的，保守的，行不通的」。「現在中國的一切，正是病在太合國情，未嘗病在不合國情或少合國情。」

錢馮二氏的見解，我固不敢苟同，蔡氏的主張也還有研討之必要。

一、國情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國情」的定義果真是如蔡氏所說的那樣嗎？也真如蔡氏所說「是一

切罪惡黑暗的搖箭牌」嗎？

蔡氏的根本誤解，是由於沒有認清「國情」的本來面目，沒有認清「國情」的真正定義。他所下的定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就錢馮二先生的高論看來」。要知道「錢馮二先生的高論」，只是錢馮二先生自己的意見，並不是「國情」本身所具有的固有意義。自己先根據「錢馮二先生的高論」來替國情下一個定義，再來根據這個定義來定「罪狀」，恐怕有點冤枉「國情」罷！

「錢馮二先生的高論」是保守說，復古說，并非國情說。國情的定義，並不是「陳陳相因」。

然則「國情」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我認為所謂「國情」，是一個的歷史條件，社會經濟狀況，階層力量對比，一句話說，所謂「國情」，就是現實。

### 二、「國情說」的用意不只一種

誠然，如蔡氏所說，有些人以「國情」為藉口拒絕進步，但這只是少數人，只是「為了自私自利的」少數人。嚴格的說，這種以「國情」為藉口拒絕進步的人，並不是瞭解國情的人，與其說他們是「提倡國情說」不如說他們是「提倡己情說」，他們是以「己情」代替「國情」，合乎己情

的就認爲合乎「國情」，就贊成，否則，就反對。

真正瞭解「國情」主張「合國情」的人，他即令「提倡國情說」，他必於主張認清現實，適應現實，改造現實。合國情，即是適應現實的需要，適應廣大人民的需要。

任何主張，方略，不能專憑自己的幻想來規定，也不能專爲「順潮流」而規定，主要是應根據一個國家的國情即現實的需要規定的。國情即現實的最大需要，是決定主張，方略有無價值的標準，是主張，方略產生和實現的根據。如果一種主張，方略離開了「國情」即現實，則其所謂主張，方略只是觀念上的遊戲。

只知「合國情」不知「順潮流」，是「固步自封」，只知「順潮流」，而不知「合國情」，是「隔靴抓癢」；「固步自封」固不可，「隔靴抓癢」又爲乎可？

并且「潮流」與「國情」，是對立的統一。潮流要成爲洶湧澎湃的主潮，要能在某一個國家實現，一定要與某一個國家的「國情」即現實相滲透相契合，不與「國情」即現實相滲透相契合的潮流，是會退潮的，是不能成爲廣大人民奮鬥的目標的。

對「國情」瞭解得愈深刻，他所提出的主張，方略必愈正確，愈有實現的根據和可能，否則便是南轅而北轍。

——這不是「國情說」的又一種用意嗎？

### 三、「國情說」是實際的

國情說也是實際的，不是空想的，是行得通的，不是行不通的。

我們承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共同性，也得承認國家和民族之間有其差別性，因爲有其共同性，所以要「順潮流」；因爲有其差別性，所以要「合國情」。

試以民主而論，民主是一種潮流，是今天泛乎世界的一種主潮；但沒有一般的抽象的民主，只有具體的實質的民主，世界各民主國家，各有各的民主，如所謂英美式的民主，蘇聯式的民主，以及中國要建立的「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民主。爲什麼各個國家民主的表現和內容各有不同？這是因爲各個國家的「國情」即現實各有不同。既「順潮流」，又「合國情」的主張，才是最實際，最行得通的主張。

再以今天東南歐各國的土地改革而論：土地改革，是民主改革的基礎，但匈牙利的土地改革，和波蘭的土地改革不完全相同，捷克的土地改革和南斯拉夫的土地改革也不完全相同。爲什麼？這也是因爲一面要「順潮流」，一面也要「合國情」。不顧「國情」即現實，而空喊順潮流，順潮流，那才真是空想，真行不通哩！

蔡氏說：「就近代世界來看，俄國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是很落後的，但它却不顧國情，因實行社會革命，而成爲世界上第一等強國。現在英國的工黨政府，也敢不顧國情，因採取社會政策，而渡過其大戰後的難關」。事實恰正相反，俄國的社會革命是顧國情的，俄國沒有資本主義的相當發達，沒有產業工人的覺醒（這即是國情）俄國的社會革命不會爆發乃至成功。英國沒有勞資的矛盾，沒有大衆熱烈要求生活的改善（這就是國情），英國工黨政府不致實行社會政策。

世界歷史上從沒有憑空的不顧國情的革命和改革！

### 四、結論

總之，無論在政治上，在學術上，貴「順潮流」，也貴「合國情」。「國情」與「革命」并非不兩立，主張「合國情」者，是實踐的革命者，不是空談的革命者。「國情」與「潮流」也非不兩立，「順潮流」，是進化的，革命的，行得通的；而潮流之所以進化，革命，行得通，是由於潮流與特定國家的「國情」即現實相契合，適合特定國家現實的需要。

現在中國的一切，正是病在不合「國情」或少合「國情」，未嘗病在太合「國情」。「國情」即現實需要內戰嗎？「國情」即現實需要買辦官僚資本嗎？國情即現實需要愚昧，盲從嗎？

至於「由君主政治到民主政治，由私有主義到社會主義，由男子中心到男女平等，由玄學到科學」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真正進步實踐的「國情」說者并不反對。

「潮流」固不應反抗，「國情」也不可忽視！

現在借用蔡尙思氏的話，結束本文罷（「不」字是我加的）：「我敢預言，自今以後，從個人，政黨，政府到整個國家，民族，如仍太不看重國情，便不會有前途，尤其是遠大的前途！」

註 見去年十二月廿九日大公報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稿件除請專家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界投稿。舉凡經濟政治問題之探討，專題之研究介紹，翻譯及文藝通訊等作品，均所歡迎。
- 二、來稿字數請勿超過五千字，其有特殊價值者，不在此限。
- 三、來稿請用語體文或通俗文言，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或註明出處。
- 五、筆名由作者自擇，惟稿未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地址。
- 六、凡經本刊登載之稿件，非經允許，不得另在他處發表。
- 七、本刊編者對全部稿件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需用時，概不退還，其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九、來稿一經刊載，當比照一般稿費標準，從優致酬。
- 十、來稿請寄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本社。

## 民主論壇週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七日出版

本期實價每冊一千五百元

編輯及發行者

民主論壇社

上海四川北路麥拿里三十一號  
電話：(〇二)六〇五六二

總經售處

聯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二一五號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三三七弄九〇號  
電話：三七三五〇

本行辦理各項銀行業務

# 聚興誠銀行

便利  
人羣

服務  
社會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並由國家指定定經營外匯

有卅餘年歷史

## 通匯地點

上海	南京	廣州	香港	北平	天津	漢口	沙市	宜昌	昆明	貴陽
常德	成都	重慶	萬縣	宜賓	樂山	瀘縣	遂寧	內江	自流井	

# 中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專營進出口業務

附設：機器廠——供應各種式樣件  
麵粉廠——供應麵粉

地址：四川南路一號三樓

電話：87802

重慶美豐大樓四十六號

天津中正路一百卅七號

電報掛號 0195 或 Shanghai Chung Yu

外國分公司：紐約、香港、倫敦、印度

# 義豐錢莊

營業項目

一 存款  
二 放款  
三 匯兌  
四 貼現  
五 代理收匯  
六 押匯  
七 其他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交款迅速 手續簡便

信用鞏固 利息優厚

上海分莊：

地址：南波路二二三號	電話：九三三三號
地址：陝西路二三八號	電話：四一五二號
地址：重慶總莊	電話：四四一六號

# 建業銀行

經營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上海天津路二〇一號	電報掛號	九七三八
總管理處	上海東體育會路模範村二一號	電話	九七一五〇 九二七七四 九二八二一 九四五九三
重慶分行	重慶民族路一一七號	電報掛號	七三八七
成都分行	成都湖廣館街四八號	電報掛號	一〇八三
長沙分行	長沙中正路一四一號	電報掛號	七二三〇